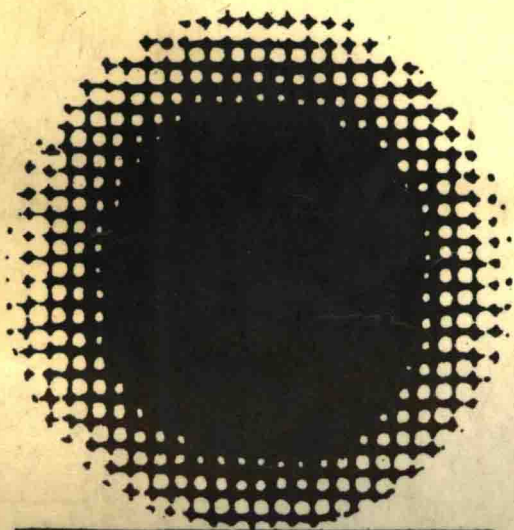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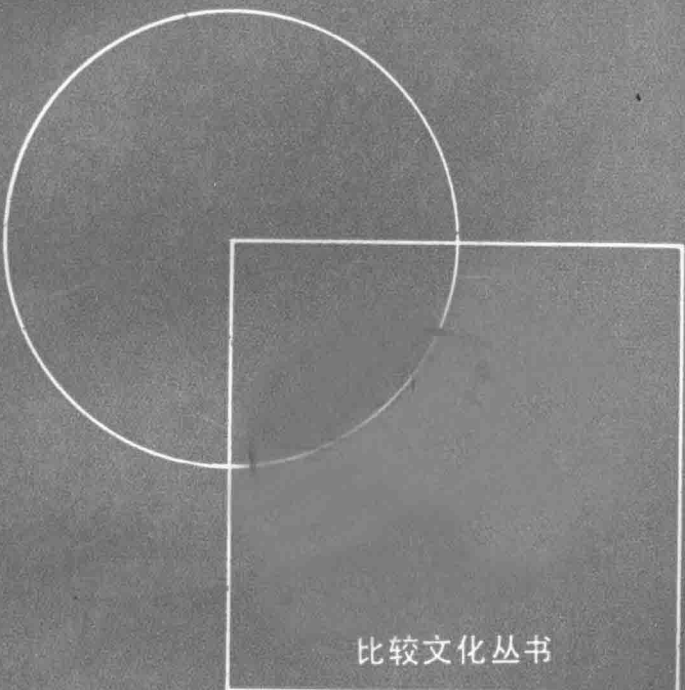
文化屏障

[英] 诺曼·丹尼尔著

王奋宇 冯钢等译 冯钢 校



比较文化丛书
Comparative Cultures Series



比较文化丛书

文化屏障

〔英〕诺曼·丹尼尔著

王奋宇 冯钢等译 冯钢 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校对 朱晓阳

文化屏障

[英]诺曼·丹尼尔 著

王奋宇 冯 钢等译

冯 钢 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1.4万

1992年2月第 一 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280

*

ISBN 7-213-00661-4

G·142 定 价, 4.15元

主 编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名誉主席 周谷城 主席 王元化

主任编务 黄万盛

编 务 黄万盛 商戈令 张士楚 蒋弋为

赵鑫珊 纪树立 周 耘 张 燕

申屠奇 潘 涔

编者献辞

经过两年的努力，《比较文化丛书》问世了。

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使我们伟大而又古老的民族从闭关锁国、封建主义的迷梦中惊醒。从此，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开始坚韧顽强地探索着民族自强之路，屡跌屡起，前仆后继。繁荣的经济、先进的科学、民主的社会成为整个民族的强烈愿望。

100多年过去了。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造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另一方面，祖国仍然贫穷，人民尚不富裕。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科学上的差距和那恶梦般的十年动乱，总是令我们民族的自强之心隐隐作痛。

反省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我们的民族成长了。我们颂扬成就，但不妄自尊大；我们正视差距，但决不悲观失望。现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心声，已

化为中国大地上宏大生动的社会现实。

改革和开放，逻辑地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文化比较研究的课题由此产生，它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不菲薄历史。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怎样弘扬这份遗产，使其走向新生？我们也不盲从西方。如何借鉴、消化西方的成就，取彼长，补己短？这正是文化比较研究的题中之旨。

多年来，学术研究历尽坎坷。比较研究自然也成了姗姗来迟的“新学科”。直至今日，比较研究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仍在研究之中。甚至，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使用，也是五花八门、约定俗成。于此，对译著和专著的采录，也就不拘一格地包含尽量大的时间跨度和足够的内容范围。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能把已有和将有的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大家。

《比较文化丛书》编委会

1986年12月

译 序

这是一本由西方人写给西方人看的、关于文化冲突问题的论著。作者诺曼·丹尼尔(Norman Daniel)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56年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早年曾从事社会保障工作,战后长期在中东地区从事文化外交工作,到过伊拉克、黎巴嫩、苏丹、埃及等国。他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东方民族文化的认识,并时时感觉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实际存在的各种障碍。作为一名西方的文化外交使者,凭藉着自己对两种文化的亲身感受和丰富的学识,他潜心研究了那些阻碍着文化沟通的屏障,并力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改变这种不尽人意的现象作出贡献。

在我国,自西学东渐以来,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断断续续却经久不息。前几年出现的那场文化大论战,或许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我并无意对这场论战妄加评说,只是觉得诺曼·丹尼尔在该书中讨论的几个问题及其观点似乎对我们深入理解文化冲突是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会被作者新奇的思路和观点所吸引,那么这种感觉的由来首先便是因为该书展示了一位西方学者在探讨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时所持

的客观、务实的治学态度。

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交流的内容应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共识。从理论上说这种客观性就是“文化无涉”。比如，双方都承认汽车比马车跑得快，电灯要比油灯亮；但不涉及对产生汽车或产生马车的那种文化的看法问题，比如说产生汽车的文化因此就比产生马车的文化要优越些等等。“文化无涉”从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在现实中，纯粹“文化无涉”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的人总是由给定的文化塑造造成的，他不仅习惯于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且还习惯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换句话说，现实的人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看待世界万物的。他总是受着他自己所属的那种文化的影响。既然如此，那么在文化交流中又如何谈得上“客观”呢？在诺曼·丹尼尔看来：既然不可能文化无涉，那就必须承认“文化限囿”；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感觉、知觉是受自己文化影响的，承认自己的文化起着阻障沟通的作用。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是它们各自适应其独特环境的特有生存方式。因此，各种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在不同文化中形成的思维习惯等总会阻碍相互之间的有效交流。这种现象哪怕是在不同的亚文化圈（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之间也都明显存在。甚至同一个人，“开车时憎恨行人，而一旦走出驾驶室作为行人就开始憎恨汽车驾驶者。”文化差异是引起相互间误解和怀疑的基础，而敌意又会使误解和怀疑迅速扩大。然而，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好”或“坏”。真正的“屏障”总是出现在人们没有意识到文化差异或者根本不承认文化限囿时。例如，我们看到西方人

接吻，开始总不习惯。这很正常，说明我们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有文化差异。如果我们意识到并承认我们的不习惯是因为我们受文化限囿，那么我们会比较客观地去看待这种行为；反之则可能会把我们的文化道德准则强加给别人，对此作出刻薄的评价，造成相互间的厌恶甚至憎恨。

诺曼·丹尼尔的这种观点是就一般文化交流而言的，但也适用于诸如文化讨论中的各种观念的交换。前几年流行“人的现代化”说法，说中国人普遍缺乏西方人的那种竞争意识，说东方民族缺少进取精神。其实这也是文化偏见。两个挑水的和尚指责两个抬水的和尚没有竞争意识。这与抬水的和尚指责挑水的和尚缺乏合作精神一样，同样是荒唐的。前些时候一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朋友对我说，在国外生活了几年才知道，所谓“现代人”的说法并没多少道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差不多，中国有什么样的人外国都有，外国有什么样的人中国也都有。正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总是无意识地在文化限囿中对外来文化作优劣评价，所以，我们以为是坏的而加以抵制的东西未必就一定坏；相反，我们觉得好的而吸取引进的东西却又时常会走样。

只要承认文化限囿的客观性，那么也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另一个结论：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因为判别优劣的标准必然是某一种文化，通常情况下都是我们自己文化的价值标准。所以，用任何标准判别文化优劣，都会造成文化交流中的人为屏障。就西方人来讲，把西方文化视为优势文化，并以此衡量其他文化，这是很常见的事。因而，诺曼·丹尼尔特别告诫西方人，这种错误观念如何阻碍了西方人对非西方民族的理解，并造成了非西方民族对西方文化的抵制。不过诺曼·丹尼尔的观点并不只是简单地对“西方中心论”这样一种西方人的自我

中心倾向提出批评。他很清楚，现代“西方中心论”的基础是西方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化程度。他认为，文化与技术是有联系的，但绝不是对应的。西方的技术从文化中产生并推动文化的发展，但技术优势却不能代表文化优势，就如西欧在技术不很发达的时代造就了莎士比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发达的技术时代能造就更多的莎士比亚。相反，在发达时代，西欧失落了造就莎士比亚的条件。作者认为，西欧应该能从与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以及从对自己历史的借鉴中重新获取那些失落了的文化成份；同时，非西方民族也应该通过与西方的平等交往获得有益的技术成果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就好像铲子与花园：同样的铲子可以用来建造不同的花园。但是，由于西方以为有技术优势也就有了文化优势，因而它既不能很好地去理解其他非西方民族文化，甚至也不能认真地借鉴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却一味要将技术的“文化增生”强加给一切民族。这实际上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交流方式。

我同意文化无优劣之分的观点。如果我们确认文化就是一种生存方式，比如像吃饭的方式；那么是用筷子，还是用刀叉，这显然无优劣可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社会中，强调这一点是很容易被误解为“守旧”或“保守”的。许多更为“激进”的观点往往强调传统文化阻碍着技术的发展进步。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文化是如何阻碍或促进技术发展的？我不知道马车是中国先有还是英国先有。但我知道有人说过，如果是中国先有马车，那么就说中国由于满足于使用马车而阻碍了汽车的发明；如果是英国先有马车，那么就说由于使用马车而导出了汽车的发明。反正怎么说都是对的。

至于引进技术是否必然会带来它的文化伴生物，这也是个

热门的话题。西方社会学中有个概念叫“结构互容”。意思是说社会是由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等部分构成的一个大系统，其中各结构部分相辅相成、功能互赖；只要其中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其他各部分也必须伴随有相应变化，否则便不相容了。根据这种说法，如果想要引进西方的技术，那么相应的文化伴生物也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有人说这是必须的“代价”一样。但是真有那么绝对吗？例如，引起西方社会中“性解放”的一个主要的技术发展因素，是避孕药的发明。然而当避孕技术推广到广大第三世界时，这些地区的性观念却依旧相当“传统”。所以，应该承认，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而技术的文化伴生物是否会随技术传播而扩散，这主要还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形式问题。诺曼·丹尼尔在书中提供了一种把文化屏障转化为“过滤器”的理论设想。并用了大量篇幅分析中世纪欧洲如何以“反伊斯兰教”为“过滤器”，既吸取了阿拉伯民族的科学知识，又抵制了与基督教不相容的伊斯兰文化侵袭。丹尼尔希望今天的非西方民族也能较好地运用“反帝国主义”这一“过滤器”来达到对非西方民族有利的文化交流效果。

对诺曼·丹尼尔的“过滤器”理论，我不想多加评论。读者肯定会在掩卷深思之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评述。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理论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值得我们去对它进行深思。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王奋宇（第一、二章），高宁（第三章），卢少春（第四章），闻莺（第五章），赵立青（第六、七章），武东生（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全书由冯钢统稿、注释翻译并校订。

冯 钢

1991年4月于浙江大学

目 录

编者献辞

译 序

第一篇 问题

- 第一章 文化交流的条件 (3)
- 第二章 西方的怀疑 (32)
- 第三章 学术交流 (56)
- 第四章 文化休克与适应 (86)
- 第五章 技术与文化 (110)

第二篇 历史的透视

- 第六章 文化的评价 (141)
- 第七章 过去和现在 (167)
- 第八章 思想的传播 (191)
- 第九章 中世纪的文化过滤器 (215)
- 第十章 现代世纪中的文化过滤器 (258)

第三篇 原则

- 第十一章 理论 (277)
- 第十二章 实践 (295)

第一篇

问题

第一章 文化交流的条件

在本书中，我将以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历史学家的规范语言和历史学术语来陈述我的观点。许多新近发展起来的技术，诸如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等，都已在使用一整套专门的语汇，但这导致的结果则往往会使人觉得深奥费解。我不采用这类技术并非意味着我讨厌或鄙视它们；非但如此，我相信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而且应该接受任何训练给予的帮助，这些训练毕竟都是历史学自身的技术形态。然而，我不愿写那种任何读者都感到费解的东西，即使对于在这方面受过训练的读者也一样。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试着讨论一些当代问题，同时又能避开当今这些习惯用语和思维模式，那将会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我自己没有创造什么令人费解的术语；虽然我们时常易于如此，但我已尽可能地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没有意外原因，也很容易导致读者觉得不知所云。我在书中使用的“屏障”(barrier)和“过滤器”(filter)这两个词，只是特取它们的功能含义。当然，如果说一切语词都含有隐喻，那么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无法例外。就好像我们说思想的“深刻”(deeply)或“高深”(highly)一样。

我从人类学中借用了文化一词，用以涵盖任何人类群体所发展起来的全部习俗、态度以及人工制品。即便那些非专业作者给了该词许多不同的含义，但是旧词典所给予它的定义——“文明的理性方面”——却已不再有用。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是文明，或什么是理性；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最富有特征的艺术就是它的生活方式，它的“风俗和习惯”。我使用“文化”一词并不仅是指“艺术的和文学的”东西，当然，它们同样应当包括在完整的定义之中。艺术、教育、科学研究、宗教仪式、经济、财政、贸易、政治、娱乐，它们是文化的所有方面；有时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就像我们有时也说“一种文明”，但通常都是指一种特质：即文化。然而，即使如此，它仍将含有比旧词典上所给予的狭窄意义更丰富的内涵。

我所讨论的问题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平等交换。要对这个问题下判断，我们就必须（至少是在理论上）辨别什么是“文化无涉”（Culture free），什么是“文化限囿”（Culture bound）。如果交流的内容，或者说被交换的对象只能伴随着产生这种内容的文化一起传递，那么，这当然就是文化限囿。如果在此过程中，受传文化竭力抵制这种文化增生（Culture accretions），那么这种交流内容就无法得以扎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文化无涉，对这一点，也许没有人会争辩。例如，草地，在苏格兰高地、叙利亚荒漠以及赤道附近的非洲地区所起的作用就具有相当大的文化差异——草地在不同地方分别成为小农场佃户稀疏的牧场、游牧民必须随季节变化而骑着骆驼去追寻的目标以及动物甚至士兵们的藏身之地。一辆小轿车，也会因文化而产生差异，有些地方每个工人都能享

有它；而在另一些地方它却成了更高级政府要员大驾光临的兆示。然而，假如说“文化无涉”一词不能成为“文化限囿”一词概念性的对应词；那么，这里还有第三种，而且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即“文化可传性”(Culture transferable)。

收音机具有文化可传性：它可以同样便利地用英语或俄语、阿拉伯语或斯瓦希里语、印地语或汉语播音。我在上面例子中提到的小轿车也具有文化可传性；所有的机器、任何技术都同样具有文化可传性。大多数人工制品对于整个人类文化来说都具有普遍性，例如，一种武器，又如，用来喝饮料的某种器具；但它们的具体形状则可以依不同的文化而变化，并且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能够相互借用、相互适应而不失去其最初的特点。一台计算机，一台收割机，或一台拖拉机，如同小轿车和收音机一样，能够为任何一个人工作；尽管采用它们势必会影响自己原有的文化并使其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自然发展。这与新石器文化采用金属相比较，既不会更艰难，也不会更容易；即便在实践中也许会容易些，但至少在原则上并不会更容易。尽管许多古代不同的文化一直都在学习新技术，并且学着同样的技术，但是它们却仍然得不到同样程度的发展：塞西亚人和原始野蛮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对于文化变迁以及对文化可传性的适应总是留有余地。无论多么普遍的人类观念，诸如“灵魂”或“祭祀”的宗教观念，以及关于“凶杀”的道义准则观念等，都具有其文化的多样性，并作为文化发展，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人类文化始终为多样性留有余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我所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要探讨当今为文化差异多样性所保留的余地还有多少。

任何一种文化状态的独特表征就是我们无法清晰地认识